



## 我与名城镇江的不解情缘

□ 吴晓峰

我出生在东北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的农村，自幼在家乡长大，然后到省会长春读大学、读研、读博，直到工作、成家。那时候的镇江，对于我来说只是书中见到过的一个地名而已。

我与镇江结缘，是与萧统的《昭明文选》研究密切相关。

1999年初，我当时工作的长春师范学院文学院，受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的委托，将于2000年8月召开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作为会议筹备组成员负责联络。在此期间，经北京大学张绍康先生推荐，我给曾任镇江市委书记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钱永波先生发了参会邀请函。钱永波先生因有事不能参会，会议期间，我接待了受他委派前来参会的两位镇江代表刘建国先生和杨再年先生。他们提交的论文分别是《萧统籍贯考》《做昭明文选，展时代风采》，这两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那时起，才明确感到自己从事的《文选》研究，原来与一座江南古城有着密切的渊源。我自己提交给大会的两篇文章也受到充分肯定，一篇是《新时期选学研究立论摘编》，另一篇是《三教合流以儒为主的文学观——从萧统对陶渊明与谢灵运的接受谈起》。

这次盛会，也是我通过“选学”研究为镇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作贡献的开始。

2002年10月，镇江主办的《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邀请我出席。我因此第一次望见镇江的山，看见镇江的水，感受了镇江人的乡愁。这次学术会议，得到“选学”界高度评价。当我们看到自己的签名，被镌刻在镇江南山招隐景区昭明太子萧统的铜像旁边的石碑上，我与大家一样被这座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吸引。

2005年6月我从吉林大学博士毕业，到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教。2006年4月，以纪念唐代大选学家李善逝世1317周年为契机，主持召开《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题会议。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钱永波会长和昌万海副会长等赴黄州参会。在此次会上，他们表达了欢迎我到镇江工作的愿望，也再次激起我对镇江的眷恋之情。

2007年6月，我举家由黄州迁到镇江，到江苏大学人文学院任教。

九年来，我已经完全融入了镇江的文化氛围，积极参与镇江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与发掘，为名城建设与保护献计献策。作为大学教授和人文学院副院长，我的首要任务是为学校人文学科建设作出贡献。经多方筹措，自2007年以来，我结合中文学科特色，在江苏大学先后组建了“六朝文学与文化艺术中心”“三国演义研究中心”；积极鼓励、支持江苏大学赛珍珠研究中心的发展，推荐中文教师参与研究。

《文选》研究，始终是我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文心雕龙》研究又成为我到镇江后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文选》与《文心雕龙》可以视为镇江六朝文学的双璧，各以其独特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我撰写的《试论〈文心雕龙〉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一文，在江苏省“文化强省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理论研讨会”上宣读，并获省文化厅和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颁发的优秀论文奖。

我还作了关于其他镇江历史名人的研究。叶玉森（1880—1933）不但诗词具工，在小说、歌曲创作方面也有独特建树，晚年亦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与罗振玉、王国维并成为研究甲骨文的三大家。我撰写并发表的《叶玉森的创作成就与今人的研究情况述略》（刘鹏与叶玉森的甲骨情结），为镇江读者全面了解叶玉森的事迹提供了依据。我发现晚清镇江知府王仁堪（1848—1893）勤政为民的感人事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为官品德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值得当今领导干部借鉴学习。我在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2013年3月的年会上发表了《晚清镇江知府王仁堪》的论文，引起广泛共鸣。研究会领导十分重视这项课题的研究，并迅速组织研究人员进行实地考察，探寻王仁堪在镇江及相关辖市区的遗迹。我还结合此项研究指导了两项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分别是《晚清循吏王仁堪镇江事迹调研》和《金庸祖父查文清在丹阳教案中的作用》，都获得了国家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的课题立项，所指导的大学生毕业论文《王仁堪儒家思想研究》获得江苏大学优秀论文奖。2016年2月，我与王勇老师合作的《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献评注》一书，列为名城镇江文史研究丛书正式出版。

我希望自己在未来的时光里，进一步在镇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徜徉探寻，努力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为发掘和弘扬名城优秀传统文化多出成果，并以此将我与伦江的情缘继续延续。

# 刘彧毒计除诸弟

——读史谈片话镇江之八十三

□ 习斌

泰始五年（469），宋明帝刘彧将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的桂阳王刘休范调至京师建康，任扬州刺史去了，而将刘休祐任命为南徐州刺史。刘休范是刘彧的十八弟，而刘休祐是刘彧的十三弟。刘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说起来，其中还颇有原委。

原本担任扬州刺史的是建安王刘休仁。当初刘子业几次想杀死刘彧，都是刘休仁在一旁说好话，才使刘彧化险为夷。刘彧在兄弟里排行十一，刘休仁排行十二，两人年龄仿佛，关系很好。刘彧登基之后，也很信任刘休仁。这么一来，朝中很多官员投靠刘休仁门下，想做个一官半职。刘彧得知后，很不开心。

刘休仁看出了刘彧的心思，主动上疏，请求解除自己扬州刺史的职务。刘彧顺势推舟，便把刘休范从京口调到了建康。

刘休祐被任命为南徐州刺史，从江陵赴任途经建康时，刘彧将他扣留了下来，让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到京口，暂时代理府州事务。刘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原来，刘休祐镇守江陵时，贪污暴虐，无法无天，刘彧早有耳闻。加之刘休祐性情暴躁，不止一次冲撞刘彧。刘彧虽一直隐忍不发，但却暗自怀恨在心。

刘彧考虑到自己常年多病，诸子

年幼，将来一旦自己驾崩，诸子没有办法制服刘休祐，于是便趁这次人事调动，将刘休祐留在京城，想找个机会除掉他。可以说，委任刘休祐为南徐州刺史，彻头彻尾就是刘彧布下的陷阱。

怎么除掉刘休祐呢？刘彧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刘休祐陪同自己，一起到岩山打野鸡去。眼看着天色昏暗了下来，毫无防备的刘休祐被刘彧手下的几名亲信从马背上拉了下来，一顿痛打，给打死了。

如此一来，刘彧总算除掉了一个心头之患。

刘休祐给除掉了，可刘彧心里还是不踏实。当时民间谣传，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相貌很尊贵。刘休若是刘彧的十九弟，也是最小的弟弟。刘彧派人到荆州，将民间的谣传告诉了刘休若。刘休若听了，心里很是惶恐。

这时候的刘彧又有除掉刘休若的念头了。怎么除掉刘休若呢？他又故伎重施，任命刘休若接替刘休祐，出任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

诏令到了荆州，刘休若的心腹将领都认为，刘休若只要到京口赴任，经过京师建康，就会大祸临头。他手下有个将领，名叫王敬先。王敬先劝刘休若说，不如以荆州作为根据地，和刘彧作殊死一搏，说不定还能救自

己一命。

刘休若一向胆小怕事，他不仅没有听王敬先的话，相反派人把王敬先抓了起来，并向刘彧告发了这件事。刘彧下令，把王敬先给处死了。

这边刘休若战战兢兢，从荆州起程，向京口而来。那边建康城中，刘彧却又向自己关系最好的弟弟刘休仁下手了。

泰始七年（471）五月初一，刘彧将刘休仁召进宫中，让他晚上在尚书下省就寝。当晚，刘彧派人给刘休仁送去毒药，将他毒死了。事后，刘彧害怕引起公愤，竟诬陷刘休仁和刘休祐勾结，图谋造反。

刘休若到京口之后，听说刘休仁被毒死，更加恐惧。

根据史书记载，刘休若性情温和，人品厚道，大家都对他很敬重。如此一来，刘彧就对刘休若更加猜忌。

按照刘彧的计划，原本是希望在刘休若赴任途中将他截住，留在建康，然后设计除掉。但如今趁着自己处理刘休仁的当口，刘休若已到了京口。怎么才能除掉他呢？

刘彧想了两个方法。一是派使臣到京口去诛杀刘休若，二是征召刘休若到建康来，入京朝见。可刘彧感觉这两个方法都不妥当。如果派人到京口去，万一刘休若拒不从命，可能引发兵变。如果征召刘休若入朝，引起他的猜疑，也可能引起乱子。

怎么办呢？刘彧又想出了一条毒计。

这年六月初十，刘彧下诏，进行人事调整。他将江州刺史刘休范任命为南徐州刺史，而将刘休若任命为江州刺史。同时，刘彧还亲笔给刘休若写了封信，邀请他下个月来京师，参加七月七日的皇家盛宴。这封信写得言辞恳切，来打消刘休若的疑心。

一个月后，刘休若应约来到建康。如此一来，正中刘彧下怀。七月初九夜，刘彧派人到巴陵王府，赐刘休若自尽。如此一来，刘彧仍然健在的兄弟，除了刘休范之外，全部被杀害了。

刘彧让刘休若和刘休范“换防”，原本就是设的一条毒计。刘休若一死，刘彧下令，刘休范复任江州刺史。



南朝壁画

## 许浑卒于何时？

□ 乔长富

曾经参观“丁卯洞村舍”，想了解一些情况。在北侧小屋的墙上，读到一篇介绍许浑的文章，文中说许浑“卒于咸通”。

对于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因为对于许浑的卒年，唐代顾陶在《唐诗类选后序》中早就有相当明确而可信的说法。文章说：“余为《类选》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觉老之将至。今大纲已定，勤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负平生。近则杜舍人牧、许鄂[鄂]州浑，泊张祐[祐]、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没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外，若有所得，别为卷轴，附于二十卷之外，冀无见恨。”（《全唐文》卷七六五）

《唐诗类选》编成的时间，顾陶在《唐诗类选序》中说“时大中景子之岁也”（同上）。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三也说“唐顾陶大中丙子岁所编《唐诗类选》”。“大中景子”即大中丙子，亦即大中十年（856）。根据这样的记载，许浑应当是卒于大中十年前“二三年”（“二三年”是约数）间。

顾陶是唐武宗会昌四年（844）进士，与赵嘏同年及第（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大中年间为校书郎

（《新唐书·艺文四》）。他与许浑是同时代人。而且他用30年时间编成《唐诗类选》，对当时诗人的情况当有充分了解。所以他说许浑去世的时间，应当比后人的推断更为可靠。

再说，他提到的杜牧是卒于大中六年冬，确实距大中十年“身没才二三年”。顾陶将许浑置于杜牧之后，则许浑的卒年当在大中六年冬以后距大中十年“二三年”的时间之内。

因此，笔者过去曾依从其说，并根据许浑大中八年仍然在世的事实，按照惯例，推定许浑卒年为大中九年（没有证据证明许浑大中八年已去世），大中九年到大中十年首尾二年，与顾陶所说“身没才二三年”也不矛盾。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仍然是符合事实的。

而所谓“卒于咸通”说，是依据《吴越备史》卷一“咸通中，京师有望气者言钱塘有王者气，乃遣侍御史许浑、中使许计贲壁壅塞望山腹以压之”的记载。有专家据此推定说许浑卒于咸通七年（866）或稍后。但是，根据有关记载，诗人许浑一生任职于御史台时，只做过监察御史（一称“侍御”），从来没有做过侍御史。所以“侍御史许

浑”不会是诗人许浑。

而且，唐代官员一般是任职到70岁退休；身体不好或不得意的官员，可能不到70岁就已退休；只有少数地位高、名气大、身体好而且“恋栈”的官员，才会延迟退休，但到80岁还不肯退休的，可谓凤毛麟角（参韩愈《论孔戣致仕状》）。至于御史台属官，事务“烦劳”，唐人还从未见有80岁尚任此官职的。

从许浑的实际说，他大约生于贞元三年（787），到咸通七年（866），他如果还活着，已是80岁。到这样的年龄，很难想象晚年自称“衰病”的许浑，他会担任这种事务“烦劳”的侍御史。所以，如果《吴越备史》所记不误，它所说的“许浑”也只是偶然与诗人许浑姓名相同而已。

唐代官员姓名相同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唐代中期就有两个李益，一个是“文章李益”，一个“门户李益”，两人门第相同，还是亲戚。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断定，《吴越备史》所说“侍御史许浑”只是与诗人许浑姓名相同而已，并不是同一个人。

自然，据“侍御史许浑”推定诗人许浑也“卒于咸通”，不能成立。从诗



许浑像

人许浑的仕历看，确凿证据表明，他官终郢州刺史；从前人的记载看，他卒于大中十年前后的“二三年”，证据也很确凿。

所以，仅凭一条不可靠的“证据”，就说许浑“卒于咸通”，不符合事实，显然错误。

